

## 【历史研究】

## 欧亚草原西部游牧经济的生成及特点

张龙海

(山东航空学院 人文学院, 山东 滨州 256603)

**摘要:** 欧亚草原西部游牧经济的产生经历了一个从定居混合经济到定居畜牧经济再到半游牧、游牧经济的漫长过程。在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之交, 欧亚草原西部游牧生产方式产生的先决条件已然具备, 并在人口与自然环境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最终诞生, 欧亚草原西部进入游牧时代。移动、迁徙是游牧经济的基本特点, 由于欧亚草原西部各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不同, 其迁移模式也不尽相同。

**关键词:** 欧亚草原西部; 游牧经济; 安德罗诺沃文化; 木椁墓文化; 迁移

**中图分类号:** K 8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86/j.issn.2097-4973.2024.02.014

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主要活动于横跨欧亚大陆的北纬47°—58°的草原地带, 即欧亚草原。它自多瑙河下游起, 呈连续带状向东延伸, 经东欧平原、西西伯利亚平原、哈萨克丘陵、萨彦-阿尔泰山系、蒙古高原, 直达东北平原, 东西绵延一万多公里, 是地球上最宽广的草原。

本文讨论的欧亚草原西部指萨彦-阿尔泰山系以西的欧亚草原地区。由于纬度较高, 自然降水较少, 欧亚草原不适于发展农业, 但丰富的草场资源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适宜条件。因此, 几千年来畜牧业一直是欧亚草原居民的主要经济方式。游牧民族所特有的游牧经济是畜牧经济的一种, 其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在讨论游牧起源时, 学者们所称“游牧”一般指的是“专业化游牧”, 即在特定环境中以特定动物来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方式。<sup>[1]63</sup>但需要注意的是, 从事专业化游牧的人群必须要有农作、狩猎、贸易和掠夺等生业作为经济补充, 纯游牧是不存在的。

## 一、欧亚草原西部游牧经济生成的动因

对于早期人类进入游牧经济的动因, 学者们首先强调的是气候的转变。哈扎耶夫(Khazanov)认为, 欧亚草原和近东游牧业的形成均与干旱的气候有关, 干旱使得部分兼营牧业的农民放弃农业变成游牧人群。<sup>[2]95-99</sup>马绍(Marshall)认为, 2500年前雨型的转变是东非专业化游牧形成的重要原因。<sup>[3]</sup>雅各布斯(Jacobs)也认为, 在探讨东非专业化游牧的出现时, 应该考虑特定时期的干旱气候。<sup>[2]111</sup>关于亚洲北部苔原带驯鹿游牧业的发生, 一些学者认为气温的明显下降是其直接原因。<sup>[2]113</sup>

人口压力是另一个常被提及的动因。史密斯(P. E. Smith)和扬(T. C. Young)曾提出一种观点, 专业化游牧起源于原始短期休耕农业, 在此经济阶段畜牧业只是农业生产的补充, 后来由于人口的增长, 需要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和畜牧产品, 部分人口开始放弃农业、定居, 逐步成为专业

收稿日期: 2024-08-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19世纪亚美尼亚商人在华活动及影响研究”(23BSS051)

作者简介: 张龙海(1986—), 男, 山东滨州人, 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游牧经济史研究。

E-mail: zhanglonghai1986@163.com

化游牧民。<sup>[4]1-59</sup> 李斯(S. H. Lees)和贝茨(D. G. Bates)认为,起初人们以依赖雨水的农业和畜牧业的混合经济为生,之后农业朝向沟渠灌溉的精耕发展,农业产量提高,造成人口的增加,农业聚落向农业资源的边缘地区扩展,原来的牧业愈来愈被推至更远处,为寻找水源、牧场以及为牲畜提供保护,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牧业生产,而灌溉农业也需要许多的人力,二者无法相容,于是从事两种生产方式的人群分别向专业化发展。<sup>[5]</sup> 其他学者如吉尔伯特(A. S. Gilbert)<sup>[6]105-119</sup> 和李维(T. E. Levy)<sup>[7]</sup> 也认为,原始混合经济社会的人口增加带来农耕土地的扩张,畜牧必须转移到远离农业聚落的地区,农业人群与畜牧人群分离,畜牧逐步走向专业化游牧。

以上不同学者对不同地区进入游牧生产动因的分析,同样也适合欧亚草原西部地区。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欧亚草原西部的游牧业源于之前混合经济中的畜牧业。新石器时代,欧亚草原西部食物生产型经济萌芽之际就是混合经济,包括粗放式农业和饲养几种驯养动物的畜牧业。欧亚草原西部的定居混合经济在公元前 3 千纪已经形成。至公元前 2 千纪的青铜时代晚期,木椁墓文化(Timber-grave Culture)和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分别出现于东欧草原和哈萨克草原地区。此时期的经济类型已发展为以畜牧业为主的定居混合经济。在这两种文化的早期和发达阶段,人们采取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这可以从聚落遗址中房屋的持续存在得到证明。考古所见碳化谷物种子和秸秆、手推石磨和石杵、青铜镰刀、石锄和灌溉工程遗迹等,表明木椁墓和安德罗诺沃两种文化人群都从事农业生产。但二者中的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对经济生产不起决定作用。<sup>[8]141-145</sup> 这两种人群主要从事畜牧业,以家畜的肉、奶为基本食物来源。由于木椁墓和安德罗诺沃两种文化畜牧业的发展、演化过程非常相似,下面笔者将以安德罗诺沃文化为例,分析欧亚草原西部游牧经济产生的动因。

早期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的畜牧业主要采取定居经营。聚落区有专门饲养牲畜的栅栏和房舍。冬季牲畜在畜舍中以切割的干草和枝叶为食,畜舍为牲畜(尤其是幼畜)提供了取暖过冬的居所。在其他季节,牧人驱赶畜群在居点附近

觅食,傍晚将它们赶回聚落的畜栏里。稳定的气候环境与成熟的牲畜饲养程序,保证了肉和奶制品的生产,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在这种经济体系中,人们的活动与有限的环境资源最终会出现矛盾。一方面,不断膨胀的人口需要更多的食物,而更多的牲畜则需要更宽广的草场。另一方面,即使采用了高效的饲养方式,聚落周围几千米的草场在一段时间内也会因使用过度,所能承载的牲畜数量大幅减少。以上因素促使定居点有必要转移到一个新地区,畜牧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到来了。

发达阶段的畜牧业经营以聚落的不断转移为特点。其他饲养程序与上一阶段相同,只是牧场每隔一段时间需要更换。该阶段的聚落墓地所含墓葬数量较少,每个墓地仅埋葬一代人。库兹米娜、艾多基莫夫(Evdokimov)等学者推测每一个聚落和其墓地的使用年限可能为 25~50 年。<sup>[9]62</sup> 这反映出当时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依然采用定居畜牧的经营方式,但在某一地点的草原承载力开发殆尽后,他们会迁徙到几十千米以外的新区域。新的经营方式满足了之前人口增长的需要,但也造成了新形势下的人口过剩,聚落数量不断增加,人群活动领域逐渐扩大。这可以从公元前 15—前 13 世纪欧亚草原聚落遗址的大量发现得到印证。到公元前 13 世纪之时,木椁墓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几乎占据整个欧亚草原,这种生产方式由于缺少新的发展空间而接近尾声。

生产方式的改变是解决新人口危机的最佳途径,一种更加进步的畜牧业经营形式——半游牧应运而生。半游牧更有利于开发新的草场,如山地草场、沙漠草场等。半游牧的具体经营方式是,部分人口居住在长久的聚落区,部分人口(主要是成年男性)驱赶着畜群,按照季节从一个牧场转移到下一个牧场。半游牧带来牲畜数量的无限增长,人们对农业的依赖进一步降低,同时资源与人口的矛盾和危机再次出现,其中一部分人群开始摆脱定居地的束缚,选择生产力更强的移动式放牧。半游牧是向游牧转变的基础,因为后者所需的条件在前者中已基本形成。

人口压力是欧亚草原西部人群生产方式变革和经济转型的内因,而自然条件及其周期性变

化则属于外因。当自然条件适合畜牧业的发展时,短时间内牲畜数量增加,养活的人口也随之增加,畜群和人口压力需要更大的草原面积,迫使部分人口迁移。不利的自然条件出现也会导致人口的迁移,迫使他们离开不适于传统经济发展的地区。青铜时代,欧亚草原西部气候温暖干燥适合发展复合经济。至公元前12—前8世纪,气候出现变冷、变湿趋势,欧亚草原西部半沙漠带变为草原,植被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承载力提高。<sup>[8]155、[10]153</sup>环境的变迁导致混合经济的衰落,继之而起的是生产能力更强的半游牧和游牧经济。

## 二、欧亚草原西部游牧经济生成的条件

人口压力和自然条件的变化可视为游牧经济产生的动因,而以下因素的出现则为它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

首先是牧群构成的变化。复合经济时期,牲畜中牛据首要位置,其他还有羊、马、猪、骆驼和狗等。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经济的转型,牛的数量呈减少趋势,猪完全消失,而马和绵羊的数量则逐渐增多。到木椁墓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虽然牧群的物种构成没有太大变化,但马和绵羊已成为主要的蓄养牲畜。马群和绵羊群更适合冬季牧场的开发利用。马可以用蹄子拨开冰雪层觅食,马吃草的上部,绵羊跟随其后,吃草的下部。这是为何此两种畜群在冬天一起放牧的原因。以马和绵羊为主的牧群类型更适合向游牧经济的转变。

其次是科技的创新和知识的积累。骑马术和畜挽车对游牧经济生产的意义重大。根据哈萨克草原北部波泰文化(Botai Culture,公元前3700—前3100)家马前臼齿的特征判断,有一部分已带有马衔<sup>[11]216</sup>,骑马术在该地可能已经出现。一些迹象如刻有轡头痕迹的马塑像和马雕刻等,则进一步证明公元前4千纪的欧亚草原西部已出现骑马术。骑马术的发明带来了草原经济、政治的巨大变革。如在广阔的草原上,一个徒步的男人,加一条好的牧羊犬,可以控制放养好大约200只绵羊。然而,一个骑马的男人可以在大两倍的牧场上管理约500只绵羊,并且能保持它们持续移动,为它们提供安全保护。<sup>[12]2</sup>可

见,骑马术大大提高了欧亚草原地区畜牧生产的效率,增加了牲畜的产量。古典作家如希波克拉底、希罗多德<sup>[13]323</sup>和斯特拉波<sup>[14]221-223</sup>等都记录了操伊朗语的草原游牧人以车为家。<sup>[8]108</sup>希波克拉底详细记载了这样的车的构造及其使用。“斯基泰人之所以被称为游牧人是因为他们没有房子而是住在车上。他们的车小的有四个轮子,大的六个,车上覆盖着毛毡,建造的像房子,有的有两个房间,有的有三间,可以遮挡风霜雨雪。这样的房车由两头或三头无角的牛来牵拉。妇女们住在车上,男人们骑马,跟随着他们的牛、羊和马群迁移。他们会在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直到该处的草被牲畜吃光,然后再向新的地方转移。”<sup>[15]119-121</sup>巴泽雷克墓地出土一辆类似这样的车子,有四个辐式轮子,车身由车厢和高耸其上的伞盖构成,以四匹马套驾。<sup>[16]</sup>为适于游牧,走过不能乘车的路段,马车可以拆卸。可见,公元前1千纪期间,游牧生产中车辆的使用已非常普遍,车辆的生产技术也较为高超。车的出现对草原牧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恩赐,以前不方便携带的帐篷、水和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现在可以使用牛车来运输。这样他们可以进入远离河谷的草原深处放牧,并可达数月之久,使得更加宽广的夏季草原得到利用,牧民家庭可以放养的牲畜数量大大增加,牧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因此,草原上半游牧和专业化游牧形成的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畜挽车的出现。因为它让放牧人首次跟上他们的畜群,并有能力进行长途迁徙。

欧亚草原西部一些地区发现了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的临时性圆形房屋遗址,是一种轻型框架结构住所,应该是今天圆顶帐篷的原型。这种房屋类型的发明为向游牧生活的过渡提供了可能。它既便于选址搭建,又便于拆卸移动,非常适于牧业生产和游牧生活。公元前12—前9世纪,在几乎整个欧亚草原都已出现了圆形或方形的此类小型住所。<sup>[9]65</sup>

木椁墓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显示,当时的牧人已掌握寻找水源的最佳方法。他们沿着泉水和地下水位较高的路线迁徙,并且已发明在沙漠凿井的技术。<sup>[8]155</sup>因此,沙漠草场成为牧人们新的牧场,大大开拓了他们的生

存空间。他们不仅熟知草原上的迁移路线,而且也有效探索了山地、沙漠中的迁移道路。早期铁器时代和中世纪的季节性游牧路线与晚期青铜时代遗址的地理分布完全吻合。这表明晚期青铜时代的牧人已积累了向游牧经济转变的足够经验和知识。

对埃勒诺夫斯基(Elenovsky)地区墓地出土陶罐内含物的分析<sup>[9]61-62</sup>和基佩尔(Kipel)遗址出土制作奶酪的带孔器皿<sup>[8]147-148</sup>证实,青铜时代晚期的人群已开始制作并食用乳酪制品。乳酪制品的发明既减少了肉的食用量,维持了畜群稳定,也使牧民生活更加安心,因为它可以长期保存,以备不时之需。乳酪制品是半游牧和游牧人群生存的必备“干粮”,它非常适合长期处于迁移状态的牧人食用。

至青铜时代晚期,草原人群的青铜冶炼技术已非常成熟,青铜工具和器物的制造也由锻造进化为以铸造为主。青铜生产工具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多带来了车辆生产的大发展,更多更优质的车辆可以投入半游牧和游牧生产。青铜马具的普遍使用也带来了骑马术的进步和普及,更多更精湛的骑手可以用来管理和保护畜群。

最后是军事政治因素。公元前2千纪与前1千纪之交,骑兵组织首先出现于欧亚草原地区,推动了专业化游牧的最终形成。游牧的发生地通常为农业资源匮乏的边缘地区,大多数属于干旱或半干旱气候,自然环境条件差,变率大,极不稳定。与农耕地区相比,草原地区自然灾害多,抗灾变能力弱。这可能也是草原地区畜牧混合经济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多种食物获取方式有助于提高牧人应对灾变的能力,使其顺利度过灾难期。骑兵出现后,草原牧人又多了一份生计来源——从事对外劫掠。掠夺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各草原部落的互相劫掠,二是草原部落对农耕定居区的单向掠夺。兵强马壮的部落可以通过武力威吓或掠夺聚落、城镇或其他社群,来获得贡赋和战利品以补充资源之不足。因此,一些强大的部落会放弃农耕、采集等辅助经济,选择更适合游牧生活的掠夺和战争作为一种辅助生产活动。随着他们与外部世界接触和互动的日益增多且复杂化,较高层次的政治形态“部落联盟”或“国家”便非常必要。希罗多德笔下的黑海北岸

斯基泰人是很好的例证。王族斯基泰人从事专业化游牧,并以混合经济部落和希腊殖民城邦的贡赋为重要经济补充。在与外部世界(尤其是希腊殖民城邦)的互动交往中,黑海北岸斯基泰人构建了游牧世界的第一个“准国家”政治体。

此外,强大的骑兵力量可以为专业化游牧的顺利开展提供保护。牧场、游牧路线以及畜群财产的争夺在草原世界司空见惯,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很难在资源争夺的残酷竞争中保全自己并获胜。因此,骑兵是专业化游牧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也是专业化游牧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 三、欧亚草原西部游牧经济的特点

游牧与定居畜牧的本质不同在于,前者经常游动、迁徙,而后者较为固定或偶有短距离移动。游牧一方面可以让牲畜在不同季节获得适宜的环境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人群和畜群躲避各种自然和人为风险。游牧生产的移动因自然和人为因素有不同的模式。欧亚草原西部最基本的移牧方式分为三种:子午线游牧、垂直游牧和沙漠游牧。

子午线游牧在欧亚草原西部分布最广,是其主要模式。为追寻牧草,牧民驱赶畜群南北迁徙达数百上千公里。初春畜群开始出冬季牧场,此时牲畜孱弱,牧草不丰,又有春雪的威胁,是牧民最为困难和危险的时节。7月牧群到达北方的夏季草原,此时最好的牧场多位于大河周边或沿溪谷的山坡上。对绝大部分游牧民来说,夏季是牲畜长膘最为重要的时期。因为,此时牧场广阔,牧草持续生长、鲜美而富有营养,牲畜有充足的食物和足够大的运动场地。9月份,牧群会转入秋季牧场。牲畜进入最后的抢膘时期,牧民则忙于打草为冬季储备草料。进入冬季前,牧民驱赶畜群向气候相对温和、积雪较浅的南方冬季草场转移。在冬季牧场,牧民会采取放牧和喂食草料相结合的方式饲养牲畜。因为,此时的牧草资源经常不够充足,并且干草的营养价值大大低于鲜草。来年3月份,牧民按规律驱赶牲畜前往春季牧场,开始新一轮的游牧生产。子午线游牧的迁徙路线呈南北较长的椭圆形<sup>[2]51</sup>,在一年之中牧群按季节从一个草场迁往另一个草场。

垂直放牧发生于多山地区,如阿尔泰、天山

和帕米尔等。冬季牧场一般在向阳的高山南坡或在河谷低地。每年3月,畜群由冬季牧场出来,进入春季牧场。随着气温逐渐上升,牧民赶着畜群移往山区,夏季牧群在有溪水或湖水的高山草甸觅食。10月,牧群开始向山下转移,逐步返回冬季驻营地。据考古学、民族志和历史资料显示,斯基泰人时期住在山区的牧民其经济生产方式为半游牧。<sup>[17]283</sup> 妇幼老弱留居冬营地,劳动力的主体(主要为成年男人)按固定时节和路线进山放牧。有些牧民会在冬营地兼种一些田地,但管理相当粗放。牧民的生产生活以放牧牲畜为根本。因此,此种半游牧模式也属于专业化游牧。

沙漠放牧顾名思义是一种在沙漠地区的游牧模式。由于受水源的限制,在沙漠地区牧群按径向圆(Radial-circular)路线迁移。<sup>[2]50</sup> 具体说来,牧人驱赶畜群以水源为中心作螺旋移动,随着圆周的不断扩大,当半径超过畜群往返饮水所能承受的最长距离时,牧群会迁往下一个牧场。有些沙漠地区也会成为跨生态游牧的牧民的季节性牧场之一。例如,土库曼的沙漠地区,自古至今都是一些北方游牧民族的冬季驻地。<sup>[2]34,[18]265</sup> 这里不仅是他们的冬季牧场,也是他们的春季牧场。因为此地的冬天时间较短,温度较高,而春天前有冰雪融水,后有全年中最为集中的降水,植被如茵。

牧草、水源和冬季避寒是游牧生产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它们决定了游牧的时间、方向、距离和畜群数量。由于这些自然环境因素长期保持相对稳定,所以游牧的路线、距离等自古至今

变化不大。据斯特拉波记载,古代南俄草原的游牧人跟随他们的畜群,不时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有草的地方,在亚速海附近的湿地草原过冬,在平原地区度夏。<sup>[14]221-223</sup> 又据普兰诺·加宾尼记载,中世纪金帐汗国的一支游牧人,冬季向南迁往海边,夏季沿着顿河向北进入山里。<sup>[19]54</sup>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地区的卡尔梅克人(Kalmucks)依旧会离开广阔的草原到南边的马内奇河(Manych,顿河一支流)河口及附近地区过冬。<sup>[2]34</sup> 可见,顿河流域的游牧路线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怎么改变。

游牧人迁移的距离因地理环境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例如,哈萨克草原的子午线迁移距离达1000—1500公里;天山与帕米尔山区的垂直迁移距离和土库曼的径向圆迁移距离由几十到数百公里不等。当然,游牧人迁移的路线和距离也会因突发的自然或人为原因而作临时的改变,但从长时段来看,大体上保持相对稳定。半游牧和游牧人群开辟和熟知的游牧迁移路线,有很多自古以来也是民族迁徙和商旅通行的线路。

公元前1千纪初,欧亚草原西部发生了经济生态的巨大变革,游牧生产开始兴起。不同于之前的定居畜牧,游牧是采用移动放牧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是人类为适应特定气候环境的发明,也是物质、技术和社会组织等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游牧生产的出现使得欧亚草原西部人群在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同时,也增加了草原人群与农耕人群之间的互动交流,促成了欧亚草原西部游牧文明的形成。

#### 参考文献:

- [1]王明珂. 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2]KHAZANOV A M.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 [3]MARSHALL F. Origins of specialized pastoral production in East Africa[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90(4):873-894.
- [4]SMITH P E, YOUNG T C. The evolution of early Agriculture and Culture in Greater Mesopotamia; a Trial Model[M]// SPOONER B. Population Growth: Anthropological Implic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2.
- [5]LEES S H, BATES D G. The Origins of 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 A Systemic Model[J]. American Antiquity, 1974(2):187-193.
- [6]GILBERT A S. On the Origins of 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 in Western Iran[J]. World Archaeology, 1983(1):105-119.
- [7]LEVY T E. The Emergence of Specialized Pastoralism in the Southern Levant[J]. World Archaeology, 1983(1):15-36.

- [8] KUZ'MINA E E, MALLORY J P.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M]. Leiden, Boston: Brill, 2007.
- [9] KUZ'MINA E E.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 [10] SCOTT E M, ALEKSEEV A Y, ZAITSEVA G.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on Human Migration in Eurasia[M]. NATO Science Serie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
- [11] ANTHONY D W.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2] ARUZ J.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Perspectives on the Steppe Nomads of the Ancient World[M].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3] HERODOTUS. Histories (II)[M]. trans. GODLEY A D.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14] STRABO. Geography (III)[M]. trans. JONES H L.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15] HIPPOCRATES. Airs Waters Places[M]. trans. JONES H L.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16] М. П. 格里亚兹诺夫, О. И. 达维母, К. М. 斯卡郎. 阿尔泰巴泽雷克的五座古塚[J]. 考古, 1960(7): 63-69.
- [17] DAVIS-KIMBALL J, MURPHY E M, KORYAKOVA L, et al. Kurgans, Ritual Sites, and Settlements Eurasian Bronze and Iron Age[M].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890, 2000.
- [18] OLBRYCHT M J. Persia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 the Nomads of the South Ural Region versus the Near East[J]. *Anabasis: Studia Classica et Orientalia*, 2015(6): 257-275.
- [19] 道森. 出使蒙古记[M]. 吕浦, 译. 周良霄, 注.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The Emerg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omadic Economy in the Western Eurasian Grassland

ZHANG Longha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Binzhou 256603,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nomadic economy in western Eurasian grassland has experienced a long process from a mixed settled economy to a stock-breeding settled economy, and then to a semi-nomadic and nomadic economy. At the turn of the Bronze Age and the Iron Age, the prerequisites for the nomadic production was already in place, which was finally born under the joint promotion of demographic and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western Eurasian grassland entered the nomadic era. Movement and migration ar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nomadic economy, which has different migration models due to the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Keywords:** western Eurasian grassland; nomadic economy; Andronovo culture; Timber-grave Culture; migration

(责任编辑:周新颜)

**引用格式** 张龙海. 欧亚草原西部游牧经济的生成及特点[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 2024, 41(2): 111-116. ZHANG Longhai. The Emerg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omadic Economy in the Western Eurasian Grassland[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2024, 41(2): 111-116.